《漢學研究》0254-4466
第 41 卷第 2 期 民國 112 年 6 月（2023.6）頁 257-262 漢學研究中心

書　評

何 維 剛*

Yue Zhang 張月
Lore and Verse: Poems on Histor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
Albany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, 2022, 240 pages.
ISBN 9781438486925

自宇文所安（Stephen Owen）《追憶：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》（*Remembrances: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*）以來，「記憶」成為中古文學研究的一項重要母題，此一風潮不僅從美國漢學界拓展至東亞世界，記憶書寫等問題也不斷在學界省思與再現。2018 年於宇文所安榮退之際，Wendy Swartz、Robert Ford Camany 編著 *Memory in Medieval China: Text, Ritual, and Community*，更將中古文學中「記憶」之書寫、實踐、追摹等相關研究加以推進。個體、群體意識如何與歷史、文學相互對話，過往、現實與未來如何透過記憶交織於文本，成為關注中古文學的新線索。張月 *Lore and Verse: Poems on Histor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* 一書之面世，正是探討六朝詠史詩與記憶書寫互涉的典範之作。

2022 年 11 月 29 日收稿，2023 年 2 月 14 日修訂完成，2023 年 4 月 28 日通過刊登。
* 作者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助理教授。
Ho Wei-kang, Assistant 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Chinese,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.

本書以中國中古前期的詠史詩作為主要考察文本，亦是第一本研究中古詠史詩的英文專著。「史」與「詩」無疑是以往詠史詩研究慣以切入的雙重視角，張月則著眼於「記憶」之面向，重新思考詠史詩的生成與閱讀。在宇文所安以追憶為框架的基礎上，張月將記憶書寫擴展至文化記憶（cultural memory）、交流記憶（communicative memory）、回溯記憶（retrospective memory）與前瞻記憶（prospective memory），透過不同層次的記憶作用，細密分析記憶與詠史詩寫作的互涉。

本書除了導論與結論外，共分有六個章節。第一章〈何謂中國中古詠史詩〉（“What Are Poems on Histor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?”）首先對「詠」與「史」進行考察與界定。本書認為六朝以「詠」評論、傳播歷史人物，其文化脈絡可與魏晉清談與漢末清議有所承繼。而六朝時期正是「史」部蓬勃發展之時期，透過《隋書》〈經籍志〉可知，除了正史以外，大量的古史、野史、雜史在這個時期被寫作與著錄。此一現象不僅影響了對於「史」之概念演變，同時詩人對於歷史人物的認知也可能來自於多重管道，並非僅限於正史文本。中古詠史詩寫作大多奠基於對於歷史文獻之閱讀，但本書指出懷古詩、樂府詩等體裁，同樣涉及詩人對於歷史人物之評價與書寫。閱讀史料、步履古跡，皆會引發詠史之興懷。而六朝作為寫本時代，許多「詠史」詩題未能排除是後世所加，與其受限於詩題將「詠史」視作一固定概念，不如將詠史詩之範圍與內涵視為隨著時間推移的流動，可能更符合六朝詠史詩之發展進程。

第二章、第三章作為一個整體，以左思〈詠史八首〉為核心文本，探討回溯記憶與前瞻記憶如何與〈詠史八首〉之書寫、接受產生有機連結。第二章〈回溯記憶與左思〈詠史詩〉〉（“Retrospective Memory and Zuo Si’s ‘Poems on History’”）討論左思〈詠史〉如何透過回溯記憶，將自身並列於歷史典範人物，並將歷史人物帶入當代討論。作者透過文本細讀，並參照左思〈三都賦〉與正史記錄，細緻分析〈詠史〉八首，並將此視為左思不同生命階段的人生感懷。本書尤其注意到左思對於歷史人物的詮釋與正史記載有所偏頗，〈詠史〉中馮唐、魯仲連、荊軻、揚雄等人物選擇與人物塑造，箇中隱含著左思自身的價值判斷。左思以歷史人物之典範宣揚其自身價值，並將自我置於歷史人物之間，既反映懷才不遇的現實困境，使

其理想之追求、挫敗賦予歷史意義，同時也寄託、抒發了自身情感。左思以回溯記憶省思並裁取歷史人物圖象，將過去與現在加以連結，並重新導引了詠史詩的發展可能。

相對於第二章以回溯記憶探討左思對於古代歷史人物的觀察，第三章〈前瞻記憶與中國中世早期左思〈詠史詩〉的接受〉（“Prospective Memory and the Rcecption of Zuo Si’s ‘Yongshi’ in Early Medieval China”），則試圖考察左思如何成功塑造〈詠史〉的前瞻記憶，使左思自身與〈詠史〉成為後人接受之對象與典範，具體操作則試圖通過江淹擬作、劉勰與鍾嶸的批評、以及薛憕的引用與評價，共三個層次來討論左思〈詠史〉如何為南北朝士族所接受。江淹〈雜體詩〉對於左思〈詠史〉的模習，一方面保留了左思對於世族社會的批判、遠離政治漩渦以全性命的詩思，但另一方面卻混入了張協〈詠史〉、陶淵明〈詠貧士〉之風格，除了使江淹之擬詩與左思原詩有著隱微差異，同時也蘊含了詠史詩寫作之發展進程。《文心雕龍》以詠史作為左思代表詩體，並以〈三都賦〉襯托左思的文學成就，提高了同代讀者對於左思的期望。《詩品》固然重視「吟詠情性，亦何貴於用事」，仍對左思〈詠史〉之風力持予正面評價。《北史》〈薛憕傳〉薛憕引用左思〈詠史〉詩句，反映〈詠史〉「英俊沈下僚」，已成為寒門士子抗議世族、懷才不遇的共同語言。這些詩人、文學批評家與學者，既是左思的接受者，同時也積極塑造了〈詠史〉之聲譽。

第四章〈陶淵明詠史詩所反映之人生觀〉（“Tao Yuanming’s Perspectives on Life as Reflected in His Poems on History”），則著意於詠史詩如何從政治關懷與出處反映，轉向個體情感抒發。陶淵明深諳史學，在屈賈、韓非、魯二儒等詠史詩涉及「士不遇」之出處問題時，往往強調「時」之重要性。然而除了知時進退以外，安貧樂道同時也是陶淵明詠史詩試圖實踐之理想，透過榮啟期、原憲、張仲蔚等歌詠，陶淵明不僅以歷史人物奠定榜樣，同時也將自我安置於這些歷史典範之間。陶淵明詠史詩亦重視功成身退，二疏因適時退離得以全身全志，三良雖得到政治成功，卻因殉葬賠上性命。陶淵明透過詠史將自己投射到歷史人物身上，而這些歷史人物之道德價值，又反過來幫助後世讀者瞭解陶淵明之內心世界。

相對於前三章處理左思、陶淵明針對歷史文本之詠史，第五章〈文

化記憶與謝瞻〈張子房詩〉〉（“Cultural Memory and Xie Zhan’s Poem on Zhang Liang”），則試圖以文化記憶的框架，探討五世紀劉裕北伐時期，因歷史遺跡而興發之詠史詩。義熙十三年劉裕北伐，途經張良廟時命僚佐賦詩，而謝瞻〈張子房詩〉冠於一時。謝瞻此詩同時融會了三種記憶與四種敘述：張良生平之回溯記憶、張良聲譽之前瞻記憶、劉裕於張良廟之交流記憶、以及謝瞻自身之心理印記。透過〈張子房詩〉，張良生平的回溯記憶描繪出「士遇知己」與「功成身退」兩種士族最為渴望之際遇，劉裕以此價值觀吸引士族之投誠，同時也暗示加入劉裕正如同張良協助劉邦，最終將可成就大漢事業。張良聲譽之前瞻記憶不僅表現在建立漢朝立下之功業，同時也表現於適時抽身政治之智慧與勇氣。劉裕同時也試圖透過這樣的前瞻記憶，暗示自身得以恢復帝國穩定、並重燃士人對於國家之信心，隱微地表示了劉裕的政治野心。文化記憶得以塑造文化認同，謝瞻透過張良廟雅集賦詩的交流記憶，以此傳達世變過程中劉裕與士族微妙的心理狀態。劉裕透過與西漢劉邦、張良之連結，給予了投靠士族們成就大業的承諾，同時也透過「天命」之轉移，進一步使自己權力合法化。軍人出身的劉裕，需要士族的政治支持，而漸趨沒落的世家，同時也需要透過文化資本參與並影響國家。謝瞻透過詠史書寫作為參與政治的文化資本，然而遊走於政治動盪與家族衰落的鋼索，在全身、重振家風與政治漩渦之間，箇中亦隱含著謝瞻進退維艱的心靈困境。本章並參照了鄭鮮之、范泰隨從北伐的詠史詩，以及謝靈運、謝晦等陳郡謝氏成員之出處心態對比，論述詳盡且有創發，可謂是本書力作所在。

第六章〈《文選》「詠史」的史事探析〉（“Approaches to Lore in the ‘Yongshi’ Section of the *Wen xuan*”）的研究方法，則迴異於前面幾個章節。若說前面幾章環繞著特定之作家、作品、事件作為發想中心，本章則試圖通過《文選》編纂的眼光，重新思考「詠史」此一類目下，各種詠史詩如何展現詩人個體情感與歷史人物史事間的拉鋸。本章認為《文選》「詠史」諸詩對於史事的使用呈現三種面貌：一是重視呈現史事，詩人觀點與情感僅於詩末附帶提及、或隱藏於歷史人物之下，此以張協、盧諶為代表。張協〈詠史〉對於二疏的討論多出自《漢書》記述，盧諶〈覽古〉對於藺相如的讚揚則完全符合《史記》情節，張協與盧諶二首詠史詩不以抒發詩人

情感為主，卻在過往的典範人物的歌詠中找到慰藉與情感寄託，並開闢了理解歷史的新途徑。二是以歷史人物史事作為佐證，以支持、抒發作者之觀點與情感。詩人已然預設讀者具有相當的歷史知識，因此並不鋪陳細節，而就史事直發議論，此以王粲〈詠史〉、曹植〈三良〉、顏延之〈五君詠〉為代表。王粲透過歌詠三良、抨擊秦穆公，間接表達對於曹氏政權的忠誠；曹植則關注三良的忠誠與責任感，透過典範對象尋求自身情感認同。而顏延之對於竹林七賢中阮籍的歌詠，已非關注歷史生平與細節，而是歷史人物的風情與內在性格。這種直觀評論歷史人物的寫作手法，除了得見詩人之洞察力，同時也反映詩人直接傳達他們對於歷史的理解。三是全詩重視闡發詩人感受，僅將史事作為典故技巧或是詩人情感的寄託，此以鮑照與左思為代表。鮑照〈詠史〉僅在末聯提及嚴君平史事，全詩選擇性地呈現嚴君平追求道德卻甘於孤貧的面向，寄託了鮑照的價值皈依。而左思〈詠史〉對於馮唐形象的裁取，與《史記》面貌大不相同，詩人情懷的抒發凌駕於歷史事實，使詠史／詠懷的界線未必涇渭分明。

本書透過上述六個章節，鉅細靡遺地整理了中古前期詠史詩的發展進程，頗為扣合 *Lore and Verse* 之書名宗旨，亦見作者之學術關懷面向。本書明確意識到，「詠史」作為一流動觀念，詩人對於歷史人物形象之接受與塑造，並不受到「正史」之限制，箇中已然隱含了個體意識與國家意識如何看待歷史之問題。作者尤以「記憶」作為方法與框架，透過心理學領域記憶分析的多種層面，探索中古前期詠史詩的寫作與接受，使詠史詩討論得以跳脫傳統研究「詩」、「史」論述以及典故、用事等寫作技巧，得以用新的角度省思此一議題，為此書創見所在。不過作為一本學術專著，本書之選題、處理與論斷，其學術價值與意義，可能置於西方漢學脈絡會更加顯著。本書於〈緒論〉時已然明言，此書為西方第一本處理中國中古早期詠史詩的專著，前此固然有 Hans H. Frankel 撰有 *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: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Poetry*，討論西晉至北宋的歷史題材詩歌，但在研究方法與文本討論上，仍未及張月此書鮮明且具有個性。

在此基礎上或可思考的是：中古詠史詩研究在中文學界可稱蔚為大宗，本書應如何在中國文學學術脈絡下找到適合之定位，與既有研究成果進行對話、激盪，猶為未來可加關注之處。本書以文本細讀作為基底，時

見作者細膩有據之分析，然而些許論述仍脫離不了既往研究成果之影子。舉例而言，本書第六章對於《文選》所錄詠史詩之史事探析，其分類及文章推進與韋春喜〈《文選》詠史詩的類型與選錄標準探討〉頗為相近，此或許為英雄所見略同，但也間接反映因文本、觀察與論述方法的限制，難免導致類似的研究成果。此外，詠史詩涉及層面十分廣泛，例如詠史詩與樂府詩之種屬關係、詠史詩與懷古詩之分界問題、以及《文選》詩部「詠史」與「哀傷」的選錄標準，這些涉及文學史層面的探討在本書中暫未措筆，未來應如何同樣置於「記憶」之框架下加以討論，或許亦為本書將帶給中文學界的新省思。

整體來看，張月對於中國中古前期詠史詩的研究與觀察，不僅是在反省舊議題，同時也在開創新方法，箇中更為深刻的探問是：詩是什麼？歷史是什麼？回憶又是什麼？本書巧妙地結合了考據與闡釋，在史家描繪的真實與虛構之間，觀照出詩人如何摸索歷史、詮釋歷史甚至開創歷史，以回應這些探問。「記憶」如何進入人心、形塑歷史，不僅涉及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時間聯繫，同時也是文化與群體的交流媒介。中古詠史詩文本仍具有開放與多元討論的可能，*Lore and Verse* 一書的研究取向，無疑為此可能做出了理想示範。